

近代日本语言同化观研究

——以保科孝一为例

陈林俊

(上海外国语大学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上海 200083;
常州大学 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 江苏 常州 213164)

摘 要: 保科孝一是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重要制定人与语言同化政策的主要鼓吹者, 其语言政策观主要建立在上田万年的“国语”观基础上, 以“同化”为核心, 可分为两大维度: 对内的标准化同化与对外的殖民化同化。通过研究可发现, 日本近代语言同化观滥觞于语言纯粹主义, 逐渐发展到语言民族主义, 最终异化为语言帝国主义。其既是近代日本对东亚传统文明秩序的逆反与对中华文明的反噬, 亦是对近代亚洲危机的过度反应。日本语言同化观的形成中还有对欧美列强尤其是德国经验教训等的模仿与借鉴, 以及对军国主义政府的主动迎合。通过保科孝一的语言同化观, 还可发现近代语言同化政策内部的多重矛盾, 这些左右了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的制定与推行, 也决定了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发展的轨迹与命运。

关键词: 近代日本; 语言同化; 国语; 语言帝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 H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2458(2017)06-0064-07

DOI: 10.14156/j.cnki.rbwtyj.2017.06.009

语言政策是“人类社会群体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对某种或某些语言所采取的立场、观点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条例、规定、措施等等”^[1], 斯波斯基将其分为三个组成部分, 即语言实践、语言信仰(或曰语言意识形态、语言观)与语言规划或管理。其中, 语言信仰为语言管理的基础^{[2]7-17}, 由此可见, 对语言观的探究是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视角在近代日本语境中具有特殊的意义。王向远(2005)曾指出, “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策的设计者, 大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 而是民间学者、文化人。日本的侵华, 往往是‘有思想能

力’的学者文化人首先提出设想、加以论证, 并首先在民间制造舆论, 然后思想舆论一旦形成, 则影响政府决策, 并由政府加以组织实施”。具体而言, 其分为四个阶段“①学者文化人个人的侵华设想、方策的提出, 但基本处于书斋状态; ②学者文化人的侵华主张传媒化, 并为许多民众所理解, 也为政府所接受; ③学者文化人战争舆论与军国政府之间的互动及侵华战争的发动; ④学者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搜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略的主体。”^[3]在近代日本对外扩张活动的历史维度中, 一些语言学者也在其中融入了自

收稿日期: 2016-11-29
基金项目: 2016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代日本在华语言同化政策研究”(16BYY055); 2017 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日本在华日语教科书研究”(2017SJB1763); 2017 年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当代日本语言推广政策研究”(2017M611601)
作者简介: 陈林俊(1980—), 男, 江苏丹阳人, 文学博士, 常州大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后科研站在站博士后, 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东亚语言政策、日汉语言对比。

身的印迹,有些从语言学角度看似正大光明的论调放到历史维度中则显得不那么体面了。

保科孝一(1872—1955年)在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史上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出身于东京大学国文科,为近代日本著名国语学者、语言学家上田万年(1867—1937年)的弟子,毕业后即任职于东京大学,并历任文部省国语教科书编撰委员、文部省教育调查委员、文部省国语调查主任、内阁国语审议会干事长等职,同时,保科孝一还创刊《国语教育》杂志并长期担任主编,正如其自传式著作《国语问题五十年》书名所示,其长期活跃在日本国语教育与改革的第一线。保科孝一兼顾了学术研究与实际政策的制定策划等实务,其观点不仅折射出了当时日本语言政策的脉络,也对战后的日本国语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借助日本馆藏的原始资料,对保科孝一这一在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史上举足轻重人物的语言同化观加以解读,从侧面勾勒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的轮廓,解析其内在动因,分析其存在的矛盾。

一、保科孝一的语言同化观

保科孝一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于国语教育与改革,尤其作为语言同化政策的提倡者而为人所知。其语言政策观主要有以下核心论点。

(一)“国语”概念——保科孝一语言观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

保科孝一的语言观深受其师上田万年的影响,上田万年率先引入了欧洲民族主义运动期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基本理念,提出了“国语”的概念,其指出“国语乃帝室之藩屏,国民之慈母”,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4]。在此基础上,保科孝一将语言同民族精神联系起来,认为国语中融入了祖先传承下来的精神,语言具有联系国民、维系团结的纽带作用。早在1902年,保科孝一就写道,“国语是国民精神的反映。国民的人文素质到了何种程度,国民精神具有何特质等都在其国语中反映出来。因此,培养德智双全的国民,与其依赖教育制度,其实更取决于国语”^{[5]199}。其在论述国语政策的代表作《大东亚战争与国语政

策》(1942)的序言中写道:“民族固有精神都融入了祖先传承下来的国语中,二者关系密切,只要民族尚存,就不可分离。若某民族能互相团结,形成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那么,将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强有力的纽带,必为其民族固有的语言”,而“一旦民族丧失了固有语言,那么思想的统一将被弱化,最后民族分崩离析,此为亘古不变之规律。”他还举了彼时的犹太人为例,认为当时犹太人虽还保留有民族宗教,但由于民族语言(希伯来语)的丧失,逐渐团结弱化,民族分崩离析。^[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继承上田万年国语概念的基础上,保科孝一进一步强调了国语的纽带功能与教化功能,尤其强调其在凝聚民族精神方面的意义,这也迎合了当时日本政府的需要。而这一国语概念,也构成了保科孝一语言政策的理论基础与出发点。

(二)保科孝一的语言同化观

在具体语言政策方面,保科孝一将语言政策粗分为两大范畴:政治性的语言政策与人文性的语言政策。政治性的语言政策是指在多民族国家或多语言国家中的公共语言选用等问题,而人文性的语言政策则指标准语的确立、标准文体的统一、汉字与假名的整理等规范化问题。同时,其又将语言政策分为三种:一为面向国内的,二为面向殖民地的,三为面向外国的。通过对其著作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语言政策观的核心即是语言的“同化”。

1. 外部同化:日语的普及推广

保科孝一主张应在多民族国家或多语言国家坚决进行统一的国语教育,对于日本这样的单语言国家(刨去几可忽略不计的阿依奴语人口之外)而言,则是应强化对殖民地人民(朝鲜、中国台湾以及南亚等地)的日语教育,将日语推广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公用语。保科孝一认为,“同化劣等文化民族时,语言教育是最具效果的”,“当然,向文化优于自身的民族普及我国语言确实有效,而对于文化程度相当、或是稍稍劣于本国的民族,则更具效果”。他认为,“对大东亚共荣圈内的居民力行日语教育,通过日语,可使日本国民与其他国民易于沟通,使他国人亲近日本文化,向日本传统精神进行同化,也能使其与我国合作,促进共荣圈的健康

发展”^{[6]17-18}。

保科孝一的这一主张可在其言论中找到解释：“如果将国语普及至其他民族，那彼此间思想即会同化，自然也就互相亲睦。尤其在统治其他民族之时，如果使被统治民族亲近统治者的语言，那么其自然心悦诚服，反抗之意一般也会被缓解弱化”。保科孝一紧接着还写道，“即使不是处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彼此独立相处的民族之间，如果将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推广到对方民族，那么，不知不觉中对方也将自然而然被同化，而使其常怀尊敬之意，提高两民族间的友好度”^{[6]10}。

2. 内部同化：日语的标准化、规范化

保科孝一从当时日语中汉字过多、假名书写标记不规范等问题出发，参考德国等国的经验，提出了日语的标准化、简明化改革。例如，在关于汉字改革方面，他列举了日本陆军 1940 年颁布的《关于武器名称及用语简易化的规定》。该规定将武器名称与使用相关汉字的难度限定在小学毕业生以内，并提出了具体的汉字使用范围。他写道，“陆军摒弃了尊崇汉字这一传统，大胆采用汉字简易化方案，从建设高度国防国家来看，实在可喜。陆军采纳了此等方案，不仅仅意味着想减轻汉字的负担，更体现了其通过汉字简易化而将由此所余精力用于振兴科学教育的宏图，实为意义深远。我国军队具有举世无双的尽忠报国无私奉献精神，其他国家都无我军这般刚强而崇高的精神力量。然而，与欧美军队相比，我军仍有不足，那即是科学知识的缺乏。”^{[6]70-71} 语言的标准化是近代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其很重要的动机之一就是建立全国性军队的需要。而除了对国语进行标准化之外，还不断简化语言，以满足国家战事吃紧、不断补充兵源的需要，也是日本在对外侵略战争不断扩大、日益陷入战争泥潭之际所呈现的独特景观。

综上所述，保科孝一语言政策观的核心可以凝炼为“同化”二字：对外是以作为日本传统精神载体的“日语”去同化朝鲜、中国以及东南亚占领区等地区，企图将日语打造成亚洲的“公用语”，以实现对殖民地的长期统治与在亚洲霸权的稳固维持；对内则通过统一日语假名标记体系、简化减少汉字、普及标准语等措施，达成本国国民语言的高

度同化，既可加强国民联系之“纽带”，亦能提高语言工具的经济性。尽管在具体语言政策的细节方面，当时日本学界还有争议，但“同化”这一核心精神却是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主要脉络与真实写照。作为著名“官制学者”的保科孝一的观点赤裸裸地显露出了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真实意图，可以说，保科孝一的语言政策观即是反映近代日本国语政策走向的现实剧本与记录影像。

二、语言同化观背后的历史缘由

任何语言政策的出台都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契机，而语言观的萌生也离不开一定的历史缘由与现实依据，正如埃杰所指出的，“所有语言政策和规划并不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而有其特定的原因。这些原因可能已经公开，也可能受到遮蔽”^[7]。那么，日本这一语言同化观的推出又有何深层次缘由与具体经纬呢？本文通过对保科孝一著作的分析，探讨这一语言观背后涌动的诡云谲波。

（一）思想根源：对中华文化的自卑使然的反噬

众所周知，自中日两国有交流以来，至明治维新为止，一直是中国（或直接或经由朝鲜半岛）向日本单向的文化传播，在日本形成了长达千余年的文化输入逆差。这种长期的文化输入逆差一方面造成了许多日本文人对中国文化的尊崇与仰慕，但另一方面，巨大的文化压力也在部分日本人心心中淤积了由于自卑而产生的逆反、甚至是反噬心理。这可以从保科孝一所提及的一个事例中看出来。山崎暗斋（1618—1682，日本江户时期思想家）有一次曾问门人：“如果孔子任大将军，孟子任副将军，来进攻吾国，尔等将怎么办？”满座寂然，于是山崎暗斋厉声说道：“如果这般，那吾等只能马上提剑将其击退。”于是满座皆服。^{[6]11} 提剑迎击曾向日本输送大陆文明的中国和朝鲜半岛，这正是 19 世纪后半期以降日本的真实写照。

在此背景下，在 17、18 世纪的“国学”研究中（如贺茂真渊、本居宣长等）产生了对所谓“纯粹日语”的追求与塑造，此亦为日本语言民族主义之滥觞。“纯粹日语”在后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以“言文一致”的形式得以“实现”，其表现是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本真的”的“日本语”的错觉被

制造出来。魏育邻（2008）认为，“纯粹日语”的实质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推行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滋生、蔓延；其结果是对内最大限度地抹平一切差异，对外则是自我东方化和在此基础上的自我绝对化、优越化”^[8]。可以说，语言民族主义构成了日本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部分，最后甚至带来了向语言帝国主义的变异。即使是如今，这种语言民族主义带来的错觉仍发挥着影响人们的思维、行为的潜作用，埃杰也指出，“日本人对自己的语言有时候似乎既感到自豪也感到惊讶。从古至今，该语言都被认为远胜其他的人类交流方式，但同时，除了纯日本血统者以外，其他人又似乎不可能学会，只能对它的美感、复杂性、精妙及魅力略知一二”，这也给日本烙下了深刻的印迹，因此，“日本这个国家表面上看国际化程度惊人，但在国际大都市的光环之下却是一个孤立、内视的国度”^{[7]60-65}。

（二）现实契机：西方列强的敌国外患与对被殖民地的感同身受

19 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日本封闭了两百多年的国门被敲开。在西学的耳濡目染之下，尤其目睹昔日亚洲霸主中国遭受的屈辱，使其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保科孝一反复提到了波兰、中国等国家遭受列强瓜分的境遇，极力从中探寻教训，将语言维持作为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例如，他认为中国与奥匈帝国等传统强国在近代的遭遇即是语言不够统一的结果。保科孝一认为，“支那国语根据南北地区一分为二。南方的语言与北方的语言殊异，几乎难以相通。如此语言相异、文化不同之国，其思想自然也分立。在支那事变之际，没有统一四百余州之政权，而分裂为数处，因此，终究无法同心协力抵御外敌，于是在皇军面前，屡战屡败，溃不成军，惨不忍睹”，“由此可见，国内分为数种方言，在国民思想的统一上，也是极为不利的。”^{[6]115-116}

自 1853 年美国舰队司令佩里用武力叩开日本的大门之后，英语教育在日本益发受到重视，学校的英语教育制度化被正式提了出来。1872 年公布的文部省令，将外语作为选修科目加入到了小学课程中，英语教育逐渐得到推广。在迅速传入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首任文部大臣森有礼甚至提出了将

英语作为国语的建议。1872 年，在致耶鲁大学惠特尼教授的信中，他提出了应废止日语，用英语作为日本国语的主张。此外，福泽谕吉、西周等著名知识分子也提出了类似主张。

在保科孝一看来，英语的普及教育是外国列强蓄意而为的。他认为：“在外国看来，在我国如此普及其文化与语言，对于其扩张民族势力而言，是非常成功的。比如，正如德川时代的汉学一样，到了明治时代，英语极具势力，从中学直至大学都成为正科。”保科孝一认为，英语的普及，损害了日本的根基，使得日本在诸事都开始依赖于英美等国，“随着英语教育日渐普及，民众对英美等国衷心崇拜，万事依存，缺乏自信。不管是在国际事务，还是在经济利益上，都唯英美两国马首是瞻，无法主张本国权益，亦无勇气如此。（中略），正因为如此醉心追随于英美，他们开始欺侮、利用我国，完全不顾国际信义。而我国仍旧唯唯诺诺，听其命而行，全无深刻反省之意。在支那事变以来，英美对我国背信弃义的态度，实在是无以言表。（中略），使国民对英美产生如此严重依赖情结的罪魁祸首，正是英语教育。”^{[6]15-17}

联系当时的国际与日本国内形势，可以说保科孝一的观点正反映了当时日本政府与社会的心路历程。随着 1889 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和 1890 年第一届帝国议会的召开，再加上日本在 1894 年甲午战争和 1904 年日俄战争中的连续胜利，日本国内国家主义倾向抬头，语言纯粹主义开始向语言民族主义转变，提倡日语、反对英语的思潮开始出现。1912 年后，在英语学习急剧升温的同时，英语教育废止论也开始出现。尤其在 1920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排日土地法案获得通过、1924 年排日移民法公布等事件发生后，英语教育废止论更是甚嚣尘上。1927 年，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藤村作在《现代》杂志 5 月号上发表文章《英语科废止的急务》，1939 年 3 月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文章《中学英语科全废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语由“敌性语”变为“敌国语”。1942 年，各大学中的英美籍教师被全部解雇^[9]。

（三）他山之石：对列强经验的借鉴与改进

目睹列强的殖民侵略，保科孝一一方面假惺惺

地表示“难禁深切同情之念”^{[6]8}，但更多的是对外国列强、尤其是德国的殖民侵略经验的模仿。德国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富国强兵直接学习的对象，在语言政策方面亦是如此。通观保科孝一的言说，充斥着对列强殖民经验的借鉴。

保科孝一通过对世界殖民史的考察得到启发，“将本国的语言移植到其他民族之上，以普及本国文化，这对于扩张民族势力来说，是最具效果的”。保科孝一曾奉命赴欧洲考察，写下了《关于德意志国内各城市小学国语教育的报告》^[10]《柏林与巴黎》^[11]等，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德国的殖民经验。保科孝一写道，“德国自从在十九世纪初占领波兰以来，为了借助德语将其同化，采取了各种措施。波兰儿童一旦满六岁，就必须进入公立小学学习，学校里一律采用德语教学，丝毫不允许使用波兰语。另外，在波兰境内任何场合的公用语都被限定为德语，波兰语的使用被严格禁止。”^{[6]7-10}

在国内的语言统一方面，德国的做法也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保科孝一介绍了德国在普法战争之后在国内选定标准语并进行强力推行的语言政策，强调了统一的语言对国家团结与国力提升的重要性。他谈到：“德意志帝国建立当初，国内的统一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威廉一世首先推行了整理帝国内语言以实现国民思想统一的政策，意义极为深远。尽管这种政策好像无法应急，然而却高瞻远瞩。由于该政策，德意志帝国从危如累卵而强盛至此。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而几近亡国，但其后仅仅二十余年后就再度繁荣而成为当今欧洲盟主，是由于德意志国民强力团结，能汇集而战之缘故。而这也无非是由于建国以来的国语政策契合时宜，充分达成了统一国民思想这一重大目的的缘故。”^{[6]103-115}

此外，除了对德国的借鉴，保科孝一还竭力宣扬对德国的超越。他谈到，“我国对于殖民地的国语政策极为稳健得当，从对朝鲜、中国台湾的统治实绩也可看出。我国没有如德国与俄罗斯对于波兰的国语政策那样过于残酷苛刻，而是宽严得当，此事亦是有口皆碑。”^{[6]28}

正如保科孝一“官制学者”的身份所昭示的一样，其对德国侵略行径的宣扬与借鉴，正是此时日

本政府的主流意向。类似的言论，在上田万年等著作中也多有所见。同样，上田万年也曾德国留学，游历欧洲。19 世纪后期的欧洲给了近代日本知识分子以强烈的震撼与深刻的启示。以德国为师，进一步推动了日本语言民族主义正式蜕变为语言帝国主义，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直接工具。

三、语言同化观背后的矛盾症结

如上所述，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灵魂即是“语言同化”，其产生于近代化日新月异与殖民活动风起云涌的激荡岁月，面世之初，就面临着先天不足与后天养分不良的尴尬境地，蕴含着无法调和的重重矛盾。

（一）逻辑矛盾：对母语维持的尊崇与对同化他者的执着

近代日本的语言同化观一开始就避免不了其与生俱来的逻辑矛盾。一方面，不管是上田万年的“国语血液”论，还是保科孝一的“国语纽带”说，都强调母语对于民族的重要性，是母亲教给的语言，是任何国民都难以割舍的。然而，他们又都力主以日语对他国国民进行语言同化教育，用作为异国语言的日语来抹杀其他国民原先的国语，同时，又都主张对国内方言的矫正教育，这不也是对母语的抹杀吗？其对中华文化与英美文化流行的抵触、反对与对日本文化对外传播的主张、宣扬，也属同理。这一显而易见的逻辑矛盾，一方面反映了近代日本语言同化政策的可笑与无理，另一方面也突出了其基于盲目语言优越论的语言帝国主义特性。

（二）情感矛盾：对弱国的同情与对强国的借鉴、模仿

一方面，作为同样面临列强侵略的后进国家，日本对波兰等被殖民地国家带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另一方面，其又不遗余力地对德国等列强的殖民、同化经验进行研究、借鉴与超越，并迫不及待地步其后尘，成为了瓜分世界列强大军的一员。这一矛盾似乎很难解释，然而，听其言观其行，近代日本的真实意图在其实际行径中显露无疑。

（三）因果矛盾：语言认同论与语言工具论的对立与合体

如果乍看上田万年、保科孝一等依据的国语

观,我们会发现其为典型的语言民族主义,其理论依据便是语言的文化认同功能。然而,这一文化认同的因,却结出了语言同化政策这一具有强烈现实工具意义的果。可以说,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这里呈现出了因果对立关系。而这一对立却在近代日本语言政策中实现了统一与合体。一方面,这体现出了日本文化中的工具至上特性;另一方面,或者说,前因只为后果,或许“国语”概念一开始就有很大成分是为了后来的对外侵略进行铺垫吧。

四、评价

“同化”构成了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核心,而其同时也是语言纯粹主义向语言民族主义,最后异化为语言帝国主义的一个演化过程,这也勾勒出了日本近代史的一个发展轨迹。

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力主同化,一方面通过标准化、规范化进行对内同化;另一方面,又通过语言殖民进行对外同化。日本语言政策的出台离不开数代知识分子的苦心经营。一方面,其规范化、标准化等具有近代意义的进步性与科学性,这点无法否认。但同时,其对语言的绝对化强调在学理上过于武断,缺乏科学性,在现实中这一政策的出台也具有明显的媚俗迎合特性。此外,近代日本语言政策在程序上也有问题,在技术上都尚未规范就已谋求在国内外的同化了,这只能说明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与殖民主义是何等心急火燎、迫不及待。日本学者关正昭也承认,“对中国大陆的日语普及政策,是在日语的标准发音、标记方式、教科书的编撰方针都无定论的情况下,文部省以及兴亚院匆匆采取的措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侵略范围扩大到亚洲多个地区,作为培植日本精神手段的日语普及工作作为军政的一环而开始被强行推行。”^{[12]39}

对内的标准化同化与对外的殖民同化构成了近

代日本语言政策的两大维度,但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始于近代,一直延续到战后,而后者在近代虽曾被强力推行,最终随着战败而灰飞烟灭。

综上所述,笔者以保科孝一为中心,基于近代日本诸多原始文献,分析了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核心基础——语言同化观。具体分析了近代日本语言同化观的理论基础与构成内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其动因所在,并剖析了其中隐匿的多重矛盾,最后在评价的基础上还交代了其不同的归宿。通过对近代日本语言同化观的分析,基本上勾勒出了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历史轨迹。关于近代日本语言政策的具体转型过程,后续还将做进一步考察。

〔参 考 文 献〕

- [1]蔡永良.论美国的语言政策[J].江苏社会科学,2002(5):194—202.
- [2]博纳德·斯波斯基.语言政策——社会语言学中的重要论题[M].张治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3]王向远.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特征_方式与危害[J].北京社会科学,2005(1):75—81.
- [4]上田万年.国語のため[M].東京:富山房,1897.
- [5]保科孝一.言語學講話[M].東京:宝永館,1902.
- [6]保科孝一.大東亜戦争と国語政策[M].東京:統正社,1942.
- [7]丹尼斯·埃杰.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M].吴志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 [8]魏育邻.日本语言民族主义剖析——从所谓“纯粹日语”到“言文一致”[J].日本学刊,2008(1):74—84.
- [9]陈林俊.日本近代外语教育政策的演变[J].教育评论,2013(5):159—161.
- [10]保科孝一.独逸国内各都市の小学校に於ける国語教育に関する報告[R].東京:文部省 1913.
- [11]保科孝一.伯林と巴里[M].東京:富山房,1914.
- [12]関正昭.日本語教育史研究序説[M].東京: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1997.

〔责任编辑 孙 丽〕

Study on View of Language Assimilation in Modern Japan

——Case Study of Hoshina Koichi

CHEN Lin-ju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Changzhou University, Changzhou, Jiangsu, 212314, China)

Abstract: Hoshina Koichi is the major maker of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main advocate of language assimilation policy in modern Japan, whose view of language policy is mainly built 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language” coming from Ueda Kazutoshi. Hoshina’s view of language policy is focused on “assimila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mensions: the internal assimilation of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external colonial assimilation. It can be found through the research that the view of language assimilation in modern Japan originated from the language purism. Then it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language nationalism and finally dissimilated to language imperialism. It is not only an antagonism to east Asian traditional civil order but also a backfire on Chinese Civilization. It also is an overreaction to the crisis in modern Asia. It can be found the imitation and reference to the western powers, especially to Germany, and the ingratiating to militarism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view of language assimilation in modern Japan. From Hoshina Koichi’s view of language assimilation, we can find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in the language assimilation policy in modern Japan, which influenced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nguage assimilation policy, and determined the developing path and destiny of modern Japanese language policy.

Key words: modern Japan; language assimilation; national language; language imperialism